增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术品格

□刘淮南

改进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文风与学风，还有一个增强其学术品格的问题。今日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面对现实中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存在的背离学术品格的事实，面对这些事实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悖于文艺理论和批评宗旨的弊端，需要加以重视。

所谓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宗旨是什么呢？我以为，即是指文艺理论和批评应该就自身的对象和存在的问题予以探讨，应该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应该就新出现的问题予以阐释和解答。可是，我们的有些文艺理论却是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既不敢面对文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谈不上就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玩弄概念和搞术语游戏，陷在洋人和古人的概念中难以自拔，结果就变成了云遮雾罩、不知所云的凌空蹈虚。而有些文艺批评只是出于相互吹捧、充当广告的目的，原本就不是为了分析问题与提出意见，压根儿就不是学术活动。于是，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便成了这些所谓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自然，这样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是不会有多少学术品格的，而普通的公众和业内的人士对之也不会是满意的。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和批评要想重振雄风，真正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必须研究并增强自身应有的学术品格。这种学术品格，既应当表现在独立性和求真性上，也应当体现在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上。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独立性指的是文艺理论和批评作为科学活动，是对有关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而不应该是实用主义地求取舆论资本或经济效益的手段。因之，这样的活动是严肃的，也是独立的，它应该与哲学、宗教一样，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所以，缺乏独立性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就可能成为其他领域的附庸，就可能功利主义地去对待对象，就可能难以坚持科学的态度，难以运用科学的方法。而求真性，则是指文艺理论和批评必须探求艺术规律，遵循艺术规律，尊重艺术规律。只有探索艺术规律，理论和批评才可成为科学活动；只有遵循艺术规律，理论和批评才能点中穴位；只有尊重艺术规律，理论和批评才会有所创建。如果放弃对艺术规律的探求、遵循和尊重，那么，理论与批评中的那种点中穴位、入木三分的效果也就无从谈起。近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之所以引不起人们多大的兴趣，虽然说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也是与自身缺乏应有的学术品格不无关系的。

应该看到，强调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独立性和求真性，虽然对文艺理论和批评来说是必要的，但若仅仅一般地强调，仍然有不够到位的感觉。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只是一般地摆脱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束缚，摆脱了利益的诱惑，而并不能够从思想上、精神上具备追求自由的品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学术品格依然是不够的。譬如，当以西方的文学理论作为依据来解释中国现象的时候，或者是将古代的文艺理论当作今天的标准的时候，这样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学术品格不能说不存在，可是就实际而言，又是需要打折扣的。换言之，这些理论和批评虽然是学术活动，也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学术成分，但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讲，这些文艺理论和批评恰恰是丧失了“自我”的，对于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实质性推进，其作用也是很小的。因而，这种理论和批评的学术品格，难以令人满意。

确实，如果认真思考的话，不难发现，我们的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往往就是以西方的或者是古代的理论为标准的，不仅没有从现实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且也不去分析西方的和古代的理论所产生的实际，于是，在所谓的西方和古代的依据中，“拉大旗作虎皮”式地进行着空泛的研究以及批评，甚至在时尚的追求中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的奇特现象，不仅使人不知所云，而且恐怕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自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这样的活动对文艺理论的推进和文艺批评的深入究竟具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这种所谓的理论与批评，不正表现出了一种不好的文风和学风吗？

而这也告诉我们，文化承传本来是正常的，但创新和建树同样是文化承传中的必要内容。所以，对于学术的理解也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这样的层次上。因为这些“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如果只是西方人的或者古人的东西，如果我们在接受中既不批判也不改造，也就是没有发展、没有创建的话，那也仅仅是停留在他人的层次上，充其量也只是已有学问和知识的重复及其阐释而已，且不说当中有些人的“卖弄”了。不难发现，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和建树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其学术品格是不会有多少实际的含量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建设，也是不会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增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学术品格，应该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一个方面，也应该是学术研究和批评中需要长期思考的一个内容。特别是联系到我们所处的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时代，对学术品格的理解也就需要更进一步。应该看到，仅仅传播西方的和古代的知识系统，那只是一种具有历史意味的以往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如果说，时代的局限性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以来的时代潮流同样也提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理论和批评中应该表现出对对象和问题的认真剖析，应该表现出对旧有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的怀疑和批判，同时也要表现出对新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的建构。换句话说，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中增强批判意识、创造精神和人文关怀，应该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也是文艺理论和批评本身的基本内涵。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以西方或古代为圭臬的依附性的思维方式，与学术品格的独立性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与批判意识、创造精神和人文关怀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独立性，就应该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之标定在对西方话语和古人话语的超越上。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的话，就会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应当看到，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人文关怀和科学意识的渗入，不仅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题中之义，也会使得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可喜的积极效果。而在这样的实践中，求真性自然也会在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得到展示。再进一步讲，这样的实践，对文学艺术的新的理解也就会蕴含于其中。

况且，就文学艺术来说，个性化世界是人们向来所追求的艺术境界，而这种个性化的程度如何，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是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对文艺理论批评家来说也应是特别关注的内容。换言之，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只有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才能产生经久耐读的艺术作品。而关注于作家艺术家是否建立了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正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任务，也是文艺理论和批评学术品格的重要体现。

作为文艺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艺理论和批评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文艺理论和批评要想有效的存在，要想真正地受人关注，虽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但离开了自身学术品格的提升，恐怕都是一种空谈。

毫无疑问，就近30多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不过，我们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这才是客观的和全面的，才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增强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学术品格，不仅是一个改进文风和学风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抵制“空谈”和进行“实干”的问题。

强化艺术的自主地位

□刘金祥

《被背叛的遗嘱》是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关于小说的艺术、欧洲小说的渊源、小说与音乐及其他姐妹艺术、小说与存在智慧的作品。作者赋予它小说的框架，让小说、回忆录、音乐评论、艺术札记、哲理随笔、翻译研究、名词释义等多种元素穿插其中，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为一体，以全然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境况。无疑，这种自由的写作方式给那些有洁癖的文体学家带来了难以归类的困惑，却因其“将文论式的思索引入小说，由评论中洋溢出文学性而消弥了作家与评论家长期的对立，使精神的自由本质得到了实现”。

昆德拉认为，欧洲哲学不善于思索人的生活，它是一种忽略具体生存的形而上学。因此，小说乘虚而入，占领了这块空地，承担起勘探“存在”的使命，“在小说的历史中有着关于存在的智慧的最大宝藏。”作为存在的小说是非体系化的，小说的主人公把生活看作对意义的寻求，所以，它呈现出无限的开放性。昆德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思想的影响力不在于去说服，而在于启发，启发另外一个思想，使得这个思想运转起来。在这方面，昆德拉非常推崇尼采，后者是一位拒绝体系的思想家，他破坏固定不变的东西，打开为常人共同接受的体系，到未知之中去冒险。尼采的这一“拒绝”使哲学开始与小说接近，它带来了巨大的主题开阔性，从此，哲学拥有了沉思人类和宇宙的一切可能性。

昆德拉认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一种艺术的历史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这段话向我们表明，艺术的道德意义是经常与历史的道德规范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实际上肇始于它们原本分属不同的价值领域；倘若有人混淆两者的差异性，对艺术提出伦理的要求。向历史中寻求审美的意义，都是一种错位的荒诞。昆德拉举拉伯雷的小说为例，证明小说是“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域”，而“创造想象的园地，将道德判断在其间中止”。这是小说家巨大的功绩，而小说家的任务也就是，在世界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之中，以幽默的艺术，肯定世间无法肯定的事物，揭示存在的智慧。

小说的艺术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结构。但是，结构又与小说家自由的个性有密切的联系，它较多地带有天才的即兴性。而昆德拉对结构的理解是，“结构”是一个包含了创作者独特性的发明，而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模式，等待着某个人去填充。因此，艺术家常常是“自己为自己发明规则”。对昆德拉而言，凡是有助于他的精神触角伸展的文体，他都愿意自由地尝试。他十分重视为许多小说家所诟病的“小说中的议论”之价值，认为那是一种小说式的思索，它们离开小说本身是不能设想的，“他的思想需要具体人物的具体境况来滋养”。与此相对应，他也十分注意文论中的故事性。《被背叛的遗嘱》有不少片段就是由那些亲切的叙述语言所构成的，例如《家庭的失宠儿》一章，昆德拉描述自己作为音乐家雅那切克的知音，漫步于音乐书籍、音像制品的市场上，搜寻着他的遗作，以“漫步”和“驻足”等形象化的方式，表现自己遐想的“展开”与“中断”，叙述主人公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潮流以外的孤独，人们对他的误解，源于这些表象背后的音乐家独特的价值与光荣，以及由“另一个欧洲”的自卑所引起的无知和粗鲁。

昆德拉将自己的这部作品命名为“被背叛的遗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这是谁的遗嘱，谁是背叛者？昆德拉在书中以布洛德对卡夫卡遗嘱的背叛为例，指斥“布洛德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了美学领域”，欧洲传统理性主义的道德意志在此对作家的审美意愿进行了一次阉割。而布洛德声称，他对卡夫卡的每一个词都凝聚了“狂热的崇拜，因此，他保存了作者生前希望抛弃的一切。这样，希洛德的绝对崇拜就必不可免地对卡夫卡的审美意愿作出了绝对的否定，因为，“美学意愿既表现在作者所写之中，也表现在他所取消之中”。这种行为之所以发生，其起因就在于，人们往往轻率地把作家的个人经历等同于他的文学表达，而其潜在的欲望则是拒绝艺术的自主地位，把它重新推回到作者的生活之中，否定艺术存在的理由。在昆德拉看来，这种背叛行为无异于编者对作者的强奸，它是道德意志潜在影响的时代风尚对个人的精神谋杀。

有感于“人们对待死人或像对一堆废料或像对一个象征。对于他的已亡去的个性，是同样的不尊重”，昆德拉呼吁人们做遵从父亲不砍掉梨树的遗愿的儿子，因为这其中存在着人的宗教维度，它携带着人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包含着人类深刻的爱：“年老的农民在他的墓里永远不会知道那棵梨树是否会被砍倒；然而对于爱着他的儿子，他不可能不服从父亲。”这就是人们在悲伤与虚无之间做出的正确选择。

作家思想的变与不变

□徐颖涛

诗人石厉的诗学论文集《诗学的范式》(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收录了他近30年来对诗学的一些理论思考，既有敏锐的思想，也不乏对古今诗学的博识。尤其在把握社会历史变迁与一些诗人内心微妙波动的关系上常常语出不凡，令人深思玩味。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中色彩斑斓，有的与时俱进，有的抱残守缺，有的甚至进退反复。这都是正常的。由于这三种社会形态在中国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不断反复中交替发展的，所以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思想在这种历史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是很复杂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有可能是片面的。在认真辨识一些中国诗人思想的变与不变的同时，石厉洞幽烛微，既看到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也看到他们自身修为所起的作用。在把握历史学家和诗人陈寅恪思想的不变时，石厉超越流俗，颇有见识。陈寅恪思想的不变显然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不能与时俱进，因而石厉认为陈寅恪和王国维绝无“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学术”，而是借用学术对已飘逝的封建时代的哀悼、怀念、留念。“对于王国维或陈寅恪来说，清朝的灭亡，便是他们精神的覆灭。”王国维和陈寅恪甚至还不如明末清初的遗民，至少明末清初的遗民没有逆历史潮流而动。“在精神上，充其量陈寅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旧文人而已。”这种论断是相当精辟的。其实，中国当代文化界有些人哄抬王国维和陈寅恪，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封建主义招魂。因而，正确地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与不变，既要道德评判，更要历史评判。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既有与时俱进的发展，也有投机善变。如果一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变化，就应该大力肯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思想的与时俱进是很值得肯定的。这就是鲁迅的思想进步是以民众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虽然斗争对象在不断的变化，但是鲁迅始终以民众为主体，与时俱进；随着对群众力量的发现，鲁迅在文学创作上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鲁迅在深入的批判中不断超越了个体的狭隘批判，将个体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了。而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变不过是“无处不春风”，即在追名逐利目的驱使下的善变。这两种思想的变是有本质区别的。而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思想的不变，则既可能是坚持真理，也可能是抱残守缺。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不变不是与时俱进，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这种不变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是难以肯定的。因此，石厉不但为王国维、陈寅恪的思想没有超越旧文人的局限而叹惋，而且为他们不是思想家而痛惜，这就将道德评判和历史评判较好地结合起来了。

与王国维、陈寅恪思想的不变不同，中国现代诗人贺敬之思想的不变却是坚持真理。文学批评家阎纲在《贺敬之论》中看到了贺敬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坚定，而石厉在品评阎纲的《贺敬之论》时则看到了贺敬之有坚定的信仰，有遗老的风骨。石厉更看重贺敬之那种不易志的风骨和操守，是相当可贵的，但却忽视了贺敬之在这个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时代里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品格，以至于鱼目混珠，则是令人遗憾的。在时代风气趋左时，贺敬之被视为右；在时代风气趋右时，贺敬之被视为左。石厉认为，时代在变，一些人在变，而贺敬之的思想在总体上可能没变。这就是贺敬之不但号召广大文艺批评家“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而且身体力行。正如没有中流砥柱，就难以衡量激流的湍急程度，贺敬之这种思想的不变将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厚厚地著上一抹亮色。

石厉不但看到有些诗人思想的不变，而且看到了那些思想不变的诗人在精神上的痛苦。而那些思想不变的诗人精神的痛苦是无法解决时代矛盾的产物。尤其是贺敬之精神的痛苦，与王国维、陈寅恪精神的痛苦是不同的。可能是年龄的差异，年长的阎纲深挖了贺敬之精神痛苦产生的历史根源，而年轻的石厉却放弃了对这种精神痛苦产生这个时代历史根源的探究。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的，贺敬之精神的痛苦是理论本身要求彻底而难以彻底的痛苦。一些文艺批评家就是忍受不了这种精神的痛苦而纷纷放弃信仰和告别理论的。这种放弃信仰和告别理论的恶果已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显现。因此，石厉看到缺失理论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建立对文艺批评的批评。这种疾呼是振聋发聩的。中国文艺批评界历来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传统。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在21世纪发展成一种声势浩大的拒绝理论的倾向。这种拒绝理论的倾向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一些理论分歧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有些人在理论上软弱和不彻底。这种文艺理论的软弱和不彻底主要表现中国当代有些文艺批评在只认强弱不认是非的氛围里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刻意迎合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需要，不但在批评文艺作品的缺陷时空说泛论，而且在褒扬文艺作品的成就时言过其实。其实，文艺批评分歧的解决不仅有赖于对文艺作品认识的深化，而且有赖于理论分歧的最终克服。石厉对这种轻视甚至拒绝理论的倾向的严厉痛斥既是殊为难得的，也是弥足珍贵的。石厉认为，中国当代文坛之所以没有高度，是因为一直不重视理论。“文艺批评在研究具体作品的同时，必须要具有理论的准备。缺少理论的文艺批评，不可能穿越优秀作品的迷雾抵达其深处。”“在这种意义上说，文艺批评只是文艺理论的副产品。理论可以是独立的，作品也可以是独立的，但惟独批评是不能独立的，它必须依附。没有理论的批评或者对作品不能全面把握的批评都是荒唐的。”这种重视文艺理论的呼声既尖锐，又深刻。中国当代文艺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自觉。

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已由赶超阶段逐渐转向创造阶段。在这种历史发展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存在一种蔑视一切理论的思想倾向。这种拒绝理论的思想倾向提倡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此相反，有些文艺理论家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界的理论自觉，倡导文艺发展的引领论。这些倡导文艺发展的引领论和理论自觉的人在那些丧失理论感的人眼里是思想僵化的，甚至是“左”的，而提倡文艺发展的多元论和告别理论的人则是思想解放的。其实，这绝不是中国当代文艺界思想步调的不一致，而是人们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的分歧。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解决这样两对矛盾中左右摇摆，一对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对矛盾是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有的偏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解放精神生产力，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多样；有的偏重解决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精神文化产品即使极大的丰富甚至可能在一些方面出现过剩的现象，这些精神文化产品也不会都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有些精神文化产品甚至是违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他们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还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化提倡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但是中国当代文化的这种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是有方向的。多样化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进步与落后的分别，甚至还会出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中国当代文化在积极汲取人类有益艺术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一些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但是，那些力倡文艺创作的多元论的文艺批评家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拒绝进一步地解决这些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有些文艺批评家是解放文艺生产力的急先锋。但是，他们却放弃了文艺产品的价值高下判断，不能积极引领当代文艺健康而有序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界既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要“让人民享有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因此，文艺发展的多元论与文艺发展的引领论的矛盾绝不是“左”与右、思想僵化与思想解放的冲突，而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的深与浅和彻底与否的分歧，也就是理论是否彻底的分歧。中国当代文艺界如果在理论自觉上更进一步，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更深一层，那么，不少分歧都会迎刃而解，就会携手推进中国当代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读者评论

摈弃崇洋媚外心理

随着国门大开，面对汹涌而来的西化浪潮，国人无不趋前尽情拥抱，吃穿住行日益“洋气”起来：吃西餐、改洋名、热衷奢侈品、海外游俨如家常便饭……有钱的固然可以享受货真价实的洋玩意儿，但没钱的也并不妨碍通过山寨产品来满足那点小小的虚荣心。这一道道眼花缭乱的崇洋景观，很自然地带来了国内洋货市场的繁荣。无论是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洋品牌巨头，还是那些通过“贴牌”、“出口转内销”的“假洋鬼子”，无不生意火爆。洋市场需求的坚挺，使得区分商品的真假，已然不再那么重要。很清楚，洋东西在国内大行其道，固然有国货质量低下的因素，但更多与国人的崇洋虚荣心理不无关系。

我们素来有拿来主义的传统，对于人家的好东西，当然不遑多让地尽管“拿来”。何况，西方创造的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也可说是属于人类所共同享有的财富。然而不得不说，许多国人在追逐洋东西时，还更多地停留于“物质”的层面，至于物质背后的“文明”因子，则似乎还显得有些遥远。我们周遭那些钱袋骤然鼓起来的富人们，在生活西化的过程中，尽管拥有一身炫目的“洋皮”，然而却难以掩饰其品位的低俗和举止的粗鄙。而西方“绅士风度”的内涵有哪些呢？大致有如下几端：精神自由、举止儒雅自然、言谈不俗而幽默、为人谦逊而尊重他人、有责任感等等，这些共同构筑起了西方绅士文化的内在肌理。对照西方绅士的内涵，其实与中国传统士人情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品格有着高度趋同性。显然，无论是西方绅士精神，还是中国士人情怀，其实质都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都体现了现代公民的某些特质。以此再来打量国人西化的现实，则未免不让人神伤：一方面是中国士人的传统美德已然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则是国人西化过程中的食洋不化而画虎类犬。

苗蛮子（广东）

诗是生命的超前表征

诗能够发动心中的灵明，从而发现普遍联系握其根本，发现生活的实质、希望、主旨和滋味。还有难以名状的旨外之旨，味外之味。诗是生命的超前表征，与潜能与趋势相关，是中华文化之文化原型。历史并不是崇拜的对象，生活只是一种机缘。

置身于生活与事业层面，真诚、淳朴、教养、审美、良心这些东西往往是有碍成功的。在人文精神贫瘠的年代，诗有什么用呢？诗无关乎鸡零狗碎、锱铢必较；无关乎一片田野，一座城市，一次职务的升迁，一种权益的争夺。但它关乎大无大有，大阴大阳；关乎大盛衰、大理乱、大博弈，大手笔大行情大输赢；关乎天时地利人和；关乎大圆满，乃至天人圆融。诗之经济量以其包含的感悟之几衡量。几是天地万物动静转化之节点。王阳明认为，太极在吾心的一点良知中。良知即是易，即是气与气之运化，即是动而未形之几。惟几可将心中的一点灵明发动起来(无也是一种几，大几。)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即诗学本体结构中蕴藏的信息、能量以及冲力，极珍贵的行为能力。故在几中，诗理诗法与心学之宗幽然会通。几攸关诗之命运，生活亦如此。战场、股市、足球赛、围棋，总是在转瞬即逝的时机中进行。若以自己之善根得遇无上法缘，则获得一个美满的瞬时。愈是一个美满的瞬时接着一个美满的瞬时，依因缘而成就，人生愈充实愈光辉。愈显现人的本真形态。愈使人感受生与爱的无限神韵：尽善尽美，自由自在。直至以“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之涵养之襟度达于超功利的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非对象性的看护。它叫诗意，是生命的本质本源本真，留下价值，成为奉献。遂以诗化之痕使人类的历史绚丽多彩并真正存在。先锋主义的现代诗人并不满足于在水中捞鱼。他可以无中生有，凭想象类比重构意象。遵循境生于象外之伟大原理，聚集解蔽敞亮澄明，通达实相，证入三昧。将有无、动静、阴阳转化之几当作变幻莫测的鱼群，想捕捉多少捕捉多少。以此创造中国诗特有的意境之美，或曰禅境。——与西方诗之酒神精神，或曰醉境二律背反，形成连接未知的疆域。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这是另一部现念史智慧史，是对本质场性的提炼，决不局限于诗人所处的狭窄境地。一个民族怎么写诗、属文决定着它的生存状态、感觉与思维，故涉及生活方式：活法、活着的样子。只有活跃而有味儿，善于重新选择，整齐收敛主一无适，才使人与体制不致僵化、冷漠、假模假式、模仿乃至模仿的模仿。诗性令人不阻隔、不狭隘、不丑陋、不至“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是诗性推动人戛戛独造并导向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人之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从而与人和谐与自然和谐。为什么需要“儿童的天真”？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希腊艺术及史诗时尝有缜密论述。与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老子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其揆一也。

诗以境界为最上，标明着一个国家精神纯洁的高度。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然而人还有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说，就是人的自由的自觉活动。谁能把深具革命性的生活教科书馈赠给没有生活也不懂生活的同时代人？使人反复反思自身存在的根本状况，让哲学流动起来，人情之美喧哗骚动起来？尤其当固有的价值观即人生的支撑点面临崩溃和裂变，仅具工具功能的科技思维模式盲目膨胀，人的自然需求几乎就是一切的时候。当可怕的市侩化趋向让人日益麻痹和猥琐，审美已处于无意识状态，情趣格调眼光追求全都低俗化了，谁包藏着生活的内驱力、导引力、不断攀援的提升之力，且提供拯救、改写语言的法门？提供革命家般的感悟、神圣的梦想、止于至善的冲动、激发激情的激情、激发想象的想象；使人重回明镜止水之中，丽日光风之内。我以为，诗能。信任诗吧！它是道性的灵魂，可以转化为一切实用智慧。

张士甫（徐州）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wybduzhelaixin@sina.com